

容闳赴美留学与“西学”东渐

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而且是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他一生热爱祖国，以自己的实践活动推动中国的除旧布新，晚年参加自立军起义，受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后客死美国。他生前用英文写过一本书，总结自己60余年的生活历程，带有自传性质，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在美国出版，后由别人译成中文，题名为《西学东渐记》，在他逝世以后3年，即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发行。

容闳，字达荫，号纯甫。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生于澳门彼多罗岛之南屏镇。他出身贫寒，父亲过早去世，一兄一姊参加劳动，12岁的容闳则贩卖些糖果，以补贴家用。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他进入由美国人勃朗主持的玛礼逊学校，第二年随学校由澳门迁入香港。勃朗发现容闳天资聪颖，有培养前途，便慷慨资助他。容闳不致因家贫辍学，后来又能去美国深造，主要靠勃朗的帮助。1847年1月，勃朗离开玛礼逊学校回美国，带走三个中国学生，其中一个就是容闳。

容闳到美国后先入孟松学校，编入英文班。1850年他考入耶鲁大学。未入耶鲁大学之前，他在经济上已陷入困境，孟松学校愿意出钱资助他继续深造，条件是必须立一志愿书，保证大学毕业后

当传教士。容闳婉言予以拒绝。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且传道固佳，未必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西学东渐记》）勃朗对容闳的意愿深表赞同。后来还是通过勃朗的活动，争得了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不附条件的资助，他得以入耶鲁大学深造。

容闳在耶鲁勤学苦读，“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大学二年级时，曾为微积分这门课程所困扰，考试常不及格。但他终于以中国人特有的毅力和勤奋争得了进步，英文论说连获首奖。他为学生中的“兄弟会”管理图书，交游甚广，并得到微薄的经济补充。1854年，他以合格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

他怀着报效祖国的心情，于咸丰四年十月（公元1854年11月）乘帆船启程回国。当时他一心向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西学东渐记》）但一旦踏上祖国大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他在广州目击了叶名琛对起义农民的大屠杀，曾“愤懑之极”，“深恶满人之无状”。在上海海关，他又亲见了通事、司员的贿赂和腐化。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他在英商公司任职，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产茶区作广泛调查达7个月之久，对百姓的疾苦和国内战争造成的荒凉衰败有了亲身的体验。他在痛苦中摸索，寻求救国真理，终于有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的天京之行。

1860年11月6日，容闳与两个美国传教士从上海乘船，经苏州、无锡、常州、丹阳，从丹阳改为陆路，于11月18日抵达太平天国首府天京。第二天便晋谒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容闳自美返国留居香港时曾与洪仁玕有一面之识，所以这次受到洪仁玕的热烈欢迎。容闳向干王提出了7条改革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

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圣经为课程之一；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他并且向干王表示：“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西学东渐记》）容闳的7条建议，并非只是“途次有所感触”而发，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安邦定国之计。这7条建议，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有许多相同之点，两人灵犀相通，所以两天后又有第二次讨论。尽管如此，洪仁玕在太平天国的筵席上只是迟到的来客，决策权力毕竟有限，所以几天以后只派人给容闳送去黄缎一幅、铃印一颗，封他个四等爵位，而对“建议”本身不置可否。容闳“决计返璧”，原物奉还，并面告干王：“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诸君，苟决计实行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则予必效奔走。无功之赏，则不敢受。”（《西学东渐记》）由于农民政权许多局限的暴露，也由于容闳认识上的某些偏见，决定了他对太平天国事业最终只是一个忠诚的同情者。他既不像洪仁玕那样积极投身于其中，也不像冯桂芬那样站在它的对立面。尽管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有作为的改革者，但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造就了历史人物的多样化。

为了报效国家，实现“造福中国”之初衷，容闳盼望的机遇终于来临。经过别人的引介推荐，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秋，他被清朝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召见。经过接触后他对曾国藩的印象极好，称曾氏为“泰山北斗”、“清代第一流人物”。这次他向曾国藩提出了发展工业，建立一个机械厂的建议。这正合曾氏的主意，因为他正想制造枪炮对付农民起义军。容闳说：“予对总督之言，与前夕对友所言者略同，大致谓应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械厂。予所注意之机械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其实他对友人所言的“母厂”，“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

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西学东渐记》)后来几经筹商,便把这个厂的厂址选在上海西北之高昌庙,即后来的“江南制造局”。

既用人则不疑人,也许是曾国藩的一个长处,至少他对容闳是如此。曾氏与容闳第二次晤谈后一星期,即授容闳以“五品军功”,委他出国购办机器,将 86,000 两的领款凭证交付给他。容闳从上海道和广东藩司各领得一半款项,便随同返美的机械工程师哈司金启程,于同治三年(公元 1864 年)春抵达纽约。容闳在美国经过一年的努力,又得哈司金的协助,将应购机器办齐,于同治四年(公元 1865 年)春由轮船装运,自纽约而东,绕好望角,安全无损地运抵上海。他本人则从太平洋横渡回到祖国。由于采办机器之功,曾国藩对他“极为嘉许”,专折上奏,授他以候补同知。同治六年(公元 1867 年)曾氏就任两江总督,专程视察江南制造局。容闳引导他参观,并乘机向曾氏建议在厂旁建立兵工学校,培育人才,“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这次曾国藩又接受他的建议,不久即付诸实施。

江南制造局和兵工学校的建立,使容闳受到鼓舞。同治七年(公元 1868 年),他又上条陈四则,请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略谓:“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西学东渐记》)据容闳自己谈,条陈的第一、三、四项只是用以作陪衬,而“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条陈一搁就是 3 年,到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才由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 3 人联衔入奏。这年冬天,清政

府批准曾、李、丁的这个奏折，派赴留学生的计划开始实施。曾国藩、李鸿章根据容闳在条陈中的建议，制定留学章程 13 条，并指令陈兰彬、容闳分任赴美留学生正、副监督。

从同治十一年(公元 1872 年)夏，到光绪元年(公元 1875 年)，容闳参与物色、挑选、组织、接送中国“幼童”120 人，分 4 批赴美留学。这批人中年龄最大的 16 岁，最少的只有 10 岁，多数是十三四岁的聪颖子弟。这些留学生受到美国友好人士的热情关怀和照顾，他们自己也刻苦攻读，进步很快。几年之后，不少人升入中等专业学校，有的竟考入了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著名学府。但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这第一件大事，却中途夭折。由于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容闳与保守顽固的陈兰彬、吴子澄为学生们的穿着、礼节等经常发生激烈争吵。陈、吴竟诬陷容闳“放纵”学生，不断向朝廷告密，国内的顽固派也趁机起来攻击。光绪七年(公元 1881 年)，腐败的清政府终于将留学生分三批全部撤回。尽管这批学生在美国没有完成学业，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又被“严加管束”，但是后来不少人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或者成为军政界的知名之士。其中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舰队司令吴应科、海军次长徐振鹏、北洋太学校长蔡绍基、上海华商银行行长钟文耀、内阁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梁敦彦等就是。

随着留美学生被召回，容闳的处境十分困难，但他不管清政府将对自己作如何处置，又坦然地回到了祖国。经过这次事件，他更深地感触到“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西学东渐记》)此后，他仍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光绪二十年(公元 1894 年)，中日战争爆发，他建议借款购舰，“抄袭日本之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896 年)，他向清政府游说，建议设立

国家银行和各省分行,并拟出总行章程 12 条、分行章程 24 条;后来又建议修筑铁路,“而权自我操”。这些建议,都未被当权者采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 1898 年),他又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唐才常成立自立会,7 月 1 日在上海召开“国会”,容闳、严复、章炳麟、唐才常等 80 余人到会,容闳被选为会长。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唐才常等遇难,张之洞指名通缉容闳。他避祸至香港,随后便去美国。

容闳一生紧跟时代潮流,每遇坎坷,从不灰心丧气。20 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兴后,他又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于 1912 年初在南京致电容闳说:“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我才智学识练达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归国。”年老多病的容闳虽然亲眼见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祖国大地诞生,但他却于 1912 年 4 月 20 日病逝于美国哈特福德城。